

当数字技术、人工智能深度介入设计生产、创作与决策,当“生成”取代部分“创作”,当代码与算法成为新的设计媒介,“新设计”时代已经到来。近日,著名设计史学者、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杭间在“人文清华讲坛”上揭示了“新设计”的核心特点与时代价值。

### ■杭间 技术、艺术与人的生活

在多数人的认知中,艺术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成熟学科,而设计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确立,其历史非常短暂。放眼世界,设计史真正从艺术史的母体中脱胎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术组织——比如世界上第一个设计史学会即英国设计史学会——还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。因此,这门学科的发展至今还不到60年。

我将设计史最为核心的三大要素提炼为:技术、艺术与人的生活。这三大要素相辅相成,缺一不可。设计史中的“设计”,既有理性的技术支撑,又有感性的艺术介入,最终落脚于人的日常生活。

在厘清了这一基本逻辑后,我们再来俯瞰历史长河。在文明的晨曦期,先民通过水、土、火的综合应用创造了陶器,并在与自然界的抗争中逐渐建立起一套维系人类存续的生活系统。在那个时代,设计为我们积淀下来的是贯穿于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用等各个环节的生存知识。而随着文明的不断向前推进,特别是在中国的汉、唐、宋时期,传统的工艺美术攀登至极高的巅峰。从宏观的设计史来看,这一时期的造物已经跨越了生存知识的初级阶段,全面进入了生活常识的成熟期。设计中的各项要素已然形成了一种完美的自治,这种“诗意的安居”内化为当时社会普遍遵循的经验与常识。

然而,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下,作为一名研究者,我强烈地感到,那种延续了千百年的从生存知识到生活常识的演进逻辑,正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突变。这种突变,正在以惊人的力量颠覆我们对设计的传统认知,并引领我们走向一个超越以往所有阶段的新纪元——“新设计”时代。

### “新设计”的诞生

2017年,我参加了“中国设计智造大奖”的评审工作。该奖项创立于2015年,被誉为“中国工业设计奥斯卡”。在这一年的评审中,一件名为“小黑侠”的中国本土公司的设计作品脱颖而出,摘得了百万大奖。这件作品的形态极其轻巧——它是一架折叠后犹如书本大小的便携式无人机,这件看似并不复杂的作品深深打动了所有中外评委。

评委会撰写的颁奖词这样写道:“这件美好的作品,彻底改变了机器记录人类生活的方式。”在它诞生之前,普通人的出游记录最多只能依靠自拍杆。然而,自拍杆无论怎样延伸,终究有所局限。而“小黑侠”的出现,打破了这种单向的、被动的物理连接。它可以通过连接手机APP实现对人的智能跟随与遥控,并在拍摄后直接进行云端编辑。这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工具,而是一个具备初步自主交互能力的系统。

事实上,今天我们看到,无人机的设计和应用进一步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除了无人机,3D打印技术的飞跃同样是颠覆造物传统的绝佳例证。今天的3D打印已经突破了单一材料的限制,横跨了无数个不同的专业领域。从宏大的建筑实体,到精密的日常器物,再到现代医学领域中那些深入人体的细微的器官零件,3D打印都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。这种基于数字模型的生产方式,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构造模式。

再来说说智能手机。在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里,有一个橱窗展示了手机的变迁:这个橱窗的一面,陈列着一部部现代的智能手机;而在橱窗的另一面,则堆放着一堆我们用过的设备——电话、照相机、打印机、记事本等。今天,智能手机内部承载的无数个APP,早已超越了传统的手机功能。实际上,智能手机已经是一个信息处理和工作的“超级终端”。

过去我们只能在科幻小说或科幻电影中才能看见的未来场景,正在加速跃入现实。从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机器人矩阵表演,到越来越多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,这种人机共存的关系正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。

从无人机、3D打印到智能终端,机器人,站在设计史的视野去审视,我们可以说:“新设计”时代已经全面到来了!

# 『新设计』时代已经到来



技术之新、观念之新、生活之新与组织之新的交织,意味着“新设计”将呈现一种“永远之新”的常态。但正是在这让人目眩神迷的“永远之新”面前,我们更加需要坚守那颗“永远之心”——也就是对人的核心价值的捍卫。  
——杭间

### “新设计”的核心特点

作为时代前沿的“新设计”,究竟具备了哪些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核心特点呢?

第一,从创作主体来看。在传统造物时代,设计的主体是凭借经验与手艺劳作的手艺人;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,主体演变成了我们熟知的专业设计师;到了现代工业社会后期,主体的形态变成了“设计师+”,也就是设计师通过跨界,引入社会各界不同的力量来进行协同设计。到了“新设计”时代,创作主体已经不可逆地演变成了“设计师+通用AI+万物”。

第二,从技术基础来看。纵观设计史,从传统时代依托于手工工具和简单器械的纯手工劳动,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基于流水线与自动化的工业生产,如今更是全面迈入了基于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的算法驱动、数字生产和虚拟产品构建的新纪元。

第三,从组织方式来看。从早期的个体劳作,到现代以设计师为主导的团队合作,再到跨越产业与社会管理维度的共同协作,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“互联网工厂”和“云管理”的系统生产模式。

第四,从作品形态来看。过去的手工设计往往是单件的、具有独立审美价值且可以由创作者个人署名命名的实体物件。现代设计将其拓展为“艺术+功能”,随后又延展为“艺术+产品+系统+社会服务”的综合系统。而今天,“新设计”的作品形态已经彻底打破了物质的边界,它是实物与虚拟的交织,是线上与线下的无缝互联,甚至在某些高维度的创新上,它本身就是一种非物质的思维。比如,“中国设计智造大奖”最近评出的百万大奖作品,就是一套基于云的社会管理系统,其实质已脱离了传统的产品形态,上升为一种纯粹的思维建构方式。

### 两种设计领袖

如果我们展开设计史的坐标系,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截然不同但又遥相呼应的历史领袖。

第一种领袖是经典设计的奠基者与先驱,也就是在“新设计”时代到来之前那些塑造了现代生活面貌的伟大灵魂。

在现代主义设计的众多著名领袖中,不得不提到英国的威廉·莫里斯。自工业革命以后,机器生产所带来的那种过于绝对的理性,以及毫无差别的标准化流水线生产,冲击了人类传统的情感需求。威廉·莫里斯和他所发起的“工艺美术运动”,就是这种历史反力的一个典型、浪漫的代表。他鲜明地强调要回归手工,要用

手艺人那种温暖的、不可复制的人性,用充满诚意的艺术化处理方式去坚决抵抗工业化制品那种过于理智、过于冰冷的面貌。

紧随莫里斯之后,将现代设计推向巅峰的是大名鼎鼎的包豪斯。包豪斯是1919年在德国魏玛创立的一所设计学院,也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,其核心主张是“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”,强调功能主义与简约设计,奠定了现代工业设计和建筑教育的基础。

与此同时,在建筑领域,现代建筑运动的核心人物、法国建筑师勒·柯布西耶正是利用钢筋混凝土等现代工业材料,创造出了我们今天极其熟悉的现代建筑样貌,极大地拓展了现代主义建筑的空间概念。

回过头来看这第一种历史领袖,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概括:在20世纪大工业迅猛发展的激荡过程中,由于机器的冷酷与人的感性生活之间严重的不适应,从而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设计的前驱。他们所有的工作,基本上都是从功能性出发,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去改造大工业生产制品的局限,进而解决社会问题,大力推进社会的进步。他们是经典设计时代的英雄。

与他们遥相呼应的第二种历史领袖则是“新设计”时代的代表人物,他们是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、埃隆·马斯克、“ChatGPT之父”萨姆·奥尔特曼。当我提到这些名字时,可能大家会感到疑惑:他们真的是设计师吗?是的,如果站在设计

史的演进角度,站在造物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立场上来看,我坚定地认为,他们不仅是设计师,而且是开启了全新纪元的“超级设计师”。

当我们审视华为近年来推出的新产品,无论是华为参与研发的问界汽车,还是华为智能手机,抑或是鸿蒙系统,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新系统。同样,埃隆·马斯克和萨姆·奥尔特曼都在不断驱动产生颠覆性的新产品,这些产品之间正在建立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关系和新价值。这种关系,已经不再像过去包豪斯时代那样,仅仅去体现某种具有具体指向的、单一的功能性和社会问题的解决,而是一种极其宏大的系统方法和价值载体。

这正是“新设计”领袖与经典设计先驱在创新逻辑上的根本分野。在经典设计时代,很多创新的发生都是从真实的生活角度出发,一步一步去细心观察,敏锐地发现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难题或者痛点,然后再想出具体的办法、设计出具体物品去解决。然而,历史推进到了“新设计”时代,这些新领袖们已经远远地跑在了整个社会真实生活需求的前面。他们不是在解决现有的生活问题,而是在提前构建未来的生活范式;他们不是在满足大众的常识需求,而是在超前定义下一代人类的生存目标。

### 设计学门类的交叉融合

最近有一些高校要“砍掉”设计专业。实际上,“砍掉”这个词被夸大了,那些校长们的原话并非“砍掉”,而是调整和整合。

为什么需要调整和整合?看看今天的摄影、新媒体以及像《黑神话:悟空》这样的数字创作就会明白,当传统媒介和生产方式被AI和数字系统全面重构时,高校传统的培养方式已无法匹配当下的就业与市场需求。高校的举措证明了,设计已经大步向前奔跑,超越了原来经典设计的基本概念。

需要强调的是,“新设计”虽不可阻挡,但并不意味经典设计(如工艺美术、室内设计、服装设计等专业)会消亡。新旧设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互补与共存,以解决绝大多数普通人在不同生活状态下的基本问题。因此,面对专业的调整,我们不要焦虑,而要回归理性判断,深刻理解“新设计”的特质。

在当代,“新设计”经历了与经典设计不同的深刻重构:从早年参与技术研发,到搭建跨学科沟通桥梁,再到系统的协同与整合。从提供单一功能,转变为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,关注全链条的社会、经济、环境与伦理,去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。尤其重要的是,今天的设计已经成为决策的参与者。设计不再依附于艺术,也不再局限于服务制造业,而是进入了政策、科技与商业的决策层面。

这种变革在世界设计组织中有清晰清晰的印记。2005年,ICSID还叫“世界工业设计组织”,其对设计的定义是“一种创造活动,其目的是确立产品多维度的品质、过程、服务及其整个生命周期系统”。但10年以后,它改名为“世界设计组织”,对设计也有了重新定义:“设计是将创新、技

术、商业、研究以及消费者紧密联系在一起,通过其输出物对社会、经济、环境及伦理方面做出回应”。

在国内,2022版国家学科目录的调整颇具代表性。在14个门类的“交叉学科”中新增了一级学科“设计学”,明确可同时授予工学和艺术学位。目前全国的院校约80%的设计专业仍偏向艺术类别,只有约20%属于交叉学科。但自新目录颁布后,走向交叉融合已是必然趋势。这种学科体制与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,恰恰印证了设计正在从“艺术依附”走向“系统整合”。

### 重归人的主体性

回顾设计史,经典的“好设计”都强调设计要为普通人服务,设计应当是朴素的、廉价的、耐用的,核心是我们常说的“设计以人为本”。

然而,在现代商业的推动下,资本并不希望产品过于耐用,而是希望它快速地更新换代。这种技术狂飙带来的隐忧,在今天的人工智能领域尤为凸显。实际上,技术无限推进的逻辑,已经形成了一种类似于“技术帝国主义”的强权趋势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算法对我们普通人的控制。当我们欲罢不能、熬夜刷屏时,当所有的内容生产都变成算法系统对你构建的信息茧房时,我们都能深刻体会到这种隐形的控制。

那么,我们该怎样找回人的主体性呢?这就引出了关于AI的法治与伦理问题。从科学的角度看,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逻辑一定是理性的,否则它无法实现技术目标。但是,这种科学上的理性是否一定“正确”?逻辑在形成产品系统后,对人类社会而言就一定是对的吗?作为普通使用者和设计师,我们该如何去信任这些计算机逻辑?又该如何去建立一种好的理性判断力?这也是我们在“新设计”时代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。

在这个技术狂飙的时代,我想要重提“审美”,因为在至少现阶段,AI不可能做到像人一样审美。20世纪80年代,“美学热”,宗白华、朱光潜、李泽厚等一批美学家,让我们在那个年代对人、美与社会形成了非常深刻的感知。但在今天,我们看到大量被商业化使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,无论是舞台背景还是视频,往往都充斥着缺乏美感、令人眩晕的奇观。因此,真正的审美感知是语言模型无法轻易通过数据学到的。

我认为,美学是我们维护人的主体性的有力依托。我希望“新设计”要回到艺术和审美的感知上来。人的审美判断力将成为破除单一逻辑理性的关键,是我们确立边界、建立与新技术之间关系的核心所在。

最后总结一下,从设计史的角度看,过去的经典设计关注生存知识,后来走向生活常识;而在“新设计”时代,我们的生命回到人的主体性,回到确立人的生命价值上来。技术之新、观念之新、生活之新与组织之新的交织,意味着“新设计”将呈现一种“永远之新”的常态,但正是在这让人目眩神迷的“永远之新”面前,我们更加需要坚守那颗“永远之心”——也就是对人的核心价值的捍卫。

## 走向治愈的春天

### 听演讲

以下是广东省人民医院乳腺科主任廖宁在《人物》2026年“女性力量”演讲活动中的演讲。

■廖宁

作为一名乳腺外科医生,我每天都要接诊上百位女性。我发现,大部分患者听到自己得了乳腺癌之后,第一反应就是“完了”,然后问我:“我还有救吗?”“我还能活下去吗?”

我想告诉大家,乳腺癌真的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。过去30年,随着筛查观念的普及、诊疗方式的进步以及乳腺癌创新药物的发明,我国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显著延长,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提高。

我是1994年开始正式接受乳腺外科医学培训的。当时在我国,一旦患者被确诊为乳腺癌,无论肿瘤大小,手术方案基本都是切除乳房,也就是我们说的根治性手术。

这是一种怎样的“根治”呢?患者的胸大肌、胸小肌,包括腋下的淋巴管全都被彻底清扫。做完手术,患者的胸部只剩下一根肋骨,上面覆盖着一条手术疤痕,腋窝像山洞一样凹进去。很快,患者的手臂会出现严重的水肿,非常疼。所以,当时乳房全切患者的生活质量是非常差的。我心中充满疑问: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吗?

1997年,我远赴法国深造。在法国国家肿瘤中心,我第一次见到保乳手术——那对我来说是一场视觉冲击。我从未想过乳腺癌手术还可以这样完成。那不是技术的突破,也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,医学可以在治愈疾病的同时,更温柔地对待患者的人生。后来我查过数据,20世纪90年代,法国乳腺癌女性患者的保乳率已经达到50%。原来,既精准地清除病灶又保留女性身体之美,是完全可能的。

于是,我想将这种更科学、更尊重患者的治疗方式带回来。从法国留学回来后,我一直在推动保乳和乳房重建。

但是在临床工作中,阻力是多方面的。我面临的巨大挑战不是技术,而是观念——很多女性认为,切得越干净越安全。面对这种误解,我只能用科学证据说话。研究证明,对于40%符合条件的患者,保乳加放疗的效果与全切手术相当;对于20%无法保乳的患者,术中重建也能守护她们的身体完整,给予她们面对未来的勇气。

我遇到过很多患者,一开始不愿意做乳房重建,觉得太麻烦。但几年过去后,她们回来问我:“廖医生,我能不能现在做乳房重建?”面对癌症,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死亡的威胁,很少会去考虑生活质量的需求。往往要等到疾病的阴影过去后,这些需求才会慢慢浮现。

我理解她们的恐惧,但更坚信,我的责任不仅是切除肿瘤,更是帮助她们找回生活的信心和尊严。从第一位接受保乳手术的患者术后笑着说“我还是我”时,我知道手术终于有了特别的意义和温度。

医学从不止步。当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来临时,我的目标再次升级:如何用科技实现精准与微创的极致?作为学科带头人,我带领团队挑战全球首例AI辅助机器人乳腺癌保乳手术,成果在《欧洲肿瘤外科杂志》上发表。手术台上,机器人的机械臂精准切除病灶,仅在腋下留下4厘米的切口。这不是技术的胜利,更是对女性“完美治疗”的诠释——根除疾病,守护美丽。

我带领团队用20年时间专注于乳腺癌基因组学的研究,我们揭示了东西方乳腺癌人群之间肿瘤分子特征与遗传特征的不同,使每一位病人都能获得精准诊治。我们潜心钻研乳腺癌的早期诊断,致力于发现5毫米以内的肿瘤,让乳腺癌患者有更长的生存期,争取不复发。

基因检测和靶向治疗是精准诊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突破。有些基因突变的风险是与生俱来的。比如,有一个重要的遗传基因叫作BRCA,也被称为乳腺癌易感基因,包括BRCA1和BRCA2。大家熟知的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·朱莉就是因为检测到BRCA1突变,所以选择在37岁时做了预防性双侧乳腺切除。当时,针对这一基因突变还无药可用,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针对性的靶向药。更可喜的是,这种药物目前已纳入医保。

尽管我们对乳腺癌的治疗和认知一直在进步,但直到今天,乳腺癌仍然是全球女性最高发的恶性肿瘤。因此,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演讲,向广大女性朋友做一点必要的科普——定期体检非常重要。

现在,很多女性在体检中查出乳腺结节,这也造成了新的焦虑:乳腺结节会变成乳腺癌吗?大部分情况下,结节都是良性的乳房肿块,只需要每6个月到12个月定期复查就行。针对乳腺结节,会有一个BI-RADS的分级,如果结节的分级达到4级,那就一定要去乳腺专科做进一步检查。

最后,我想告诉乳腺癌患者:不要怕,在这个世界上,有无数科学家、临床医护人员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,在为我们做着不懈努力。我们始终会和你们站在一起,一起走向治愈的春天。



2025世界设计之都大会(WDCC2025)现场。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